

從學術期刊角度看學術素養與論文寫作

劉京希

[提要] 學術文章的寫作，沒有一定之規。基本的規範須遵守，但作者也不能因此而被規範限制了獨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從而抹煞掉文章的獨特個性。完成一篇上乘的、入得了學術期刊編輯法眼的學術文章，有兩個前提：具備相當的學術素養；知悉學術文章的寫作規範。延伸開去，欲成就為一名優秀的學問家，最要緊的是形成獨特的文風。只有通過對於邏輯力量的合理運用，做到情、理、勢三者的有機統一，才能夠凝練出佳篇力作。

[關鍵詞] 學術素養 寫作規範 文風 學術論文 學術期刊

[中圖分類號] C03; C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6)04-0125-11

毫無疑問，學術期刊是展示科研成果、發佈與傳播學術信息的重要園地，擔負著推進科學研究、繁榮學術事業的使命。因此，其刊載的研究成果，首要的條件是具備原創性或創新性。

學術成果的原創性和創新性具體通過三個方面表現出來：觀點、材料、方法。一篇學術文章，既有新觀點，又發掘了新材料，採用了新的分析方法，三者通過嚴密的邏輯論證被有機地捏合為一個整體，自然是難得的佳作，但這樣的學術精品，可遇而不可求。通常情況下，一篇學術文章，就其觀點、材料、方法三者而言，能佔其二甚至其一，就可算作有其刊用價值的成果了。

完成一篇上乘的、入得了學術期刊編輯法眼的學術文章，對於作者來說，有兩個前提：有相當的學術素養；知悉學術文章的寫作規範。此外，延伸開去，作為一種追求，欲成為一名優秀的學者，還要形成自己為文的個性化風格——獨特的文風。看起來似乎就這麼簡單，但真正做起來，卻是“簡約，不簡單”。

一、關於學術素養

學術素養，簡單說，就是學養。對於人文社會科學教學與研究的從業者來說，學術素養主要由三個方面構成，就是相應的理論素養，較高的學術訓練與遵守學術規範的程度，以及獨立地開展創造性學術研究的能力。

（一）關於理論素養

“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是宋朝大詩人陸游給其子傳授作詩經驗時所寫的一首詩中的一句。詩的大意說：他初做詩時，只知道在辭藻、技巧、形式上下功夫，到中年才領悟到這種做法不對，詩應該注重內容、意境，應該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喜怒哀樂。

同樣，寫學術文章，功夫也在文章外。在哪裡？在理論素養。也就是在所從事專業的理論素養。研究者只有具備扎實的理論素養，對於本專業或者研究方向的學術源流、主要流派及其發展演變、經典作家及其代表性著作，都有清晰的把握，才算是奠定了從事學術研究的理論與學術基礎，而不至於說外行話，提假問題；也才不至於犯“錯把舊聞當新知”的錯誤。比如從事西方民主政治研究，必須追溯其源流，找到它的古希臘源頭，分析它在近古的流變，由此順流而下，才能理清它的發展演化脈絡，及其在當代西方的新發展。簡言之，所謂理論素養，也就是要具備起碼的“跟著說”的能力。不具備起碼的“跟著說”的能力，或者說不會“跟著說”，體現創新與發展的“接著說”就無從談起。而脫離開“跟著說”的專業理論梳理，另起爐灶，自說自話的所謂學術文章，恐怕難入一個優秀編輯的法眼。

為什麼人們普遍感覺寫文章難，寫好文章更難？根本原因還在於，在現有不合理、不科學的學術評價體制的逼迫下，研究者不是基於積澱、緣於興趣、帶著問題去做學問，而是背負著急於出成果的心理壓力，“為賦新詩強說愁”。理論積澱不足，學術準備不足，思想資源不足，寫作衝動不足，在“四不足”的狀態下倉促動筆，結果必然是才思枯竭，思路受限，左支右絀，有勁兒使不出。對於講求傳承的人文學科來說，學術積澱尤其重要。任何試圖脫離開前人的學術積累，抄近路、走捷徑的所謂學問者，憑才氣可能會偶有閃光，但因為缺乏“後勁”，終至回歸平庸。“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東晉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①從才智中等的人來說，北方人讀書，好像在敞亮的地方看月亮；南方人的學問，則好像在門縫裡窺視太陽。就是說，一個廣博開闊，一個深入具體。但不管哪種路數，沒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專業知識儲備，都是難以做到的。“腹有詩書氣自華。”從事學術研究，一定要把本專業甚至相近專業的經典著作予以精讀，次一級的著作起碼要予以泛讀；一定要搞清楚所研究專業或方向的源流與來龍去脈。如此，才能站得高看得遠，“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二）關於學術訓練與遵守學術規範

本質上，這是個求真的問題。“學術貴真”。求真求實，就是最為崇高的學術規範。而外在的形式化的規範，倒在其次。真正的學問，是發現、提出和解決問題，是出於興趣，對世間萬物，不論涉及何方神聖，保持批判和批評的態度，“不虛美，不隱惡”，不是為了“五斗米”而折腰。所以，遵守學術規範，根本所在，就是遵守職業道德規範，求真求實，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敢於對話——當然不是自說自話；也不是人云亦云，或者做“闡釋學”，為他人作註解；更不是竊取別人的勞動果實。在筆者看來，做學問就是做人。所以，由一個人的學問，可見出其為人。

當著一個人失去治學的興味，為了生計和升遷等功利目的做學問的時候，寫文章就成為了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而不是一件樂在其中的事情。而處在痛苦的心境中做出的所謂學問，能心有靈犀一點通嗎？能成就真正的大學問家嗎？只是浪費紙張、破壞生態而已。前些時，一句半是認真半是調侃的話，流行於微信朋友圈：“我是編輯我可恥，我為祖國浪費紙！”說的是，時下讀書人越來越少，書卻越出越多，全國年出書品種已逾37萬個，其中大部分游離於市場之外，不

能全然否認其價值，但很難說出其價值。圖書編輯個中起的是“為虎作倀”的作用。通過編輯的勞動，好紙由此變廢紙。^②其實，編輯不過是著作和論文“製作者”的替罪羊，背後那高舉鋒利的、破壞生態的“砍樹”大斧的人，非著述者莫屬。

（三）關於獨立地開展創造性學術研究的能力的問題

對於初入此道的業者來說，開展學術研究，需要一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即敢於挑戰權威，敢於挑戰定見，敢於堅持己見——這三個“敢於”，是學問得以成功的精神前提。但這個精神前提，又需要人格和思想前提——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沒有一點自主、自由的精神，沒有獨立的人格，就不能堅持己見，就可能人云亦云，也就談不上獨立地開展創造性學術研究的能力。當然，堅持己見要以扎實的論據或事實為基礎，否則就是盲目自信和自戀。

當下，我們所嚴重缺乏的，正是“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有人說，大陸的大學，即使是名牌大學，培養的也是螺絲釘；美國的名校，培養的是人才。大陸的大學，即使是名牌大學，也比較像職業學校或技術學院；美國的名校，培養的是獨立研究獨立思考的領袖人才。大陸的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很像是在開店開公司；美國的名校則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學術殿堂。深層地看，這是在教育體制上，從學前到大學，一直實行“圈養”而不是“散養”的結果。所謂大師，是在看似無序的“散養”狀態下，通過自由的學術論辯和論爭自然長成的，這有點像學術界的“自然狀態”——比如以稷下學宮為中心的“百家爭鳴”；而紮以圍欄的圈養，實質不過是馴養，無論如何養不出大師。

這三點之外，據筆者的經驗，還想強調，咬定青山不放鬆、板凳甘坐十年冷，是更為難得的治學精神和態度。當下的學風，呈現浮躁、喧囂、功利的不良狀態，為了吸引眼球，盲目追逐所謂熱點話題，製造學術快餐。但真正的學問，不是著眼當下，不是出於功利目的，不是謀生的手段，更不是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亦步亦趨，拾人牙慧；而是基於自身興趣、優勢和特長，做出長遠謀劃，進而選取學術空白和增長點，埋伏下來，不受外界誘惑地潛心研究，日拱一卒，搞他十年二十年，爭取在一個方向、一個領域、一個專業的學術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這才是做學問的真正的態度。

那麼，在現實性比較強的研究領域，如何觀照現實？對於研究者來說，當然不能不關注現實，不能不關注意識形態的變化，但也要保持適當的距離。是否可以這樣說：“跳出現實看現實，才能識得真面目。”說得再直白一點，就是在擁有扎實的理論素養、保持自我學術陣地和學術自覺的前提下，間接地觀照現實甚至大膽地預測現實發展前景，而不是被現實、被時政牽著鼻子走，做一個盲目的詮釋者，而迷失了自我和個性，失去自我判斷能力。高放先生被譽為“思想高度解放”的學者，在馬克思主義學、社會主義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領域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加之敏銳的頭腦，超人的膽識，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半個多世紀，不斷提出新的見解，不斷有新建樹。如把馬克思主義界定為“人的解放學”，在學界反響極大；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研究也不乏卓越建樹。1988年筆者曾就治學方法專訪高放先生，先生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理論研究一定要超前，要有預見性”。^③

二、關於學術論文的寫作

一篇規範的學術論文，包含著一系列基本要素：依次是標題，摘要，關鍵詞，正文，說明性注釋，參考文獻。這些基本要素，每一項都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儘管可能有人會認為，這些要素

中有些形式化的東西，不必太過在意。但作為學術期刊的編輯，並不這樣認為。文章千古事。一篇學術論文，有無學術價值，有無創新之處，不在於它的外在形式，而在於它的內在品質，但在很多情況下，外在形式又恰如其分地表達著內容，形式與內容不可二分。況且，在這個講究規範化的時代，有些形式上的東西也是不能不下功夫打理的。這也是對產品的必要的包裝。有這樣一篇論述政黨法治的內涵與特徵的文章，以下兩個標題讓你取捨：“論政黨法治的內涵與特徵”；“政黨法治：政黨文明的新形式”。顯然，前者顯平實，而後者更有視覺衝擊力，更加會引起編輯者的閱讀欲望。在此意義上，形式表達著內容，實現著內容。下面就上述要素分別予以說明。

（一）選題

毫不誇張地說，發現一個好的選題，意味著文章成功了一半。一個“好”字說得輕巧，但要真正做好它，就顯得沉重得多。凡為學術論文者想必都有這樣的體驗：為了找到一個好的選題，有時真是寢食不安，坐臥不寧，選題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一個好的選題，起碼要具備三個方面的要素：一曰新，一曰奇，一曰實。作為學術期刊編輯，選取文章就像沙裡淘金，非選題新穎者不選。當然，一雙“識珠”的慧眼不是憑空而來，它源於編者對於學界研究動態和動向的敏銳觀察與靈敏嗅覺。所以編輯從業者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眼眶子”高。

先說“新”。新，無非是說選題要新穎，要選別人所未選，言別人所未言。選題的新穎程度，往往決定著文章觀點的新穎程度。這同樣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難在要對我們所研究的領域進行全方位把握。這包括該領域研究的現狀、進展、難點和熱點，以及預期或是潛在的熱點、前景，甚至具體到領軍人物的研究狀況，也要有所知曉。有了這一鋪墊和前提，才能掌控全域而一覽眾山小，也才能通過排列組合，比較鑒別，發現或觀點、或方法、或論據的不足、空白和盲點，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選題。在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係是“單向貿易”。季羨林先生基於自己對這一領域的研究狀況以及文獻資料的佔有和瞭解，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中印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先生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這個例子是對“新”字的最好注釋。如果沒有對中印文化交流領域研究的學術史的全面掌握，就不能發現這一領域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也就難以發現“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所以說，學術研究，學術史的考察是基礎。在展開研究之前，只有弄明白在該領域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何種進展，提出了何種創見，才能確立自己研究的基點和目標，也才能弄清自己的研究到底有無價值——對前人的成果，到底是否有所補充，甚至是有所突破，還是無謂的重複。以此而論，學術研究要冷靜，要理性，不能像寫小品文那樣，靠靈感，靠感悟。不可否認，一個學術觀點的萌發，有時也可能來自靈感和感悟，但不能僅憑此靈感和感悟就急於動筆。應圍繞此一觀點，進行扎實的學術史的梳理，考察此一觀點的學術價值，看看它到底是真問題還是偽問題，真創新還是偽創新，以確保“創新”的真實有效。

再說“奇”。文貴奇崛，選題也如此。奇，說白了就是一個“異”字。就是不同於以往，不同於別人。重複以往，重複別人，重裡說那就是犯罪，犯的是“浪費資源罪”。重複性的選題和寫作，浪費自己的時間，浪費別人的時間，浪費公共資源，同時對自己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奇，

以新為基礎，以異為表現。奇而異的選題才“抓人”，才奪人眼目。趕時髦的人為什麼喜歡穿奇裝異服，也是這個道理。但是，“奇”也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就是不能脫離開前人和別人的已有研究成果另起爐灶，不能脫離開既有的研究範式，而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出奇求異，這就是歷史的邏輯，學術的邏輯。我們永遠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說話，而不是拋開前人已有的學術積澱和積累，另起爐灶，自說自話。否則，就丟掉了“討論”這一學術研究得以深入的力器。

最後說“實”。無論是“新”還是“奇”，都要有個度。離了這個度，就不叫新，不叫奇，就成了華而不實，嘩眾取寵。比如說類似“論曹雪芹之有無鬍鬚”這樣的選題，就走進了一味求新求奇的死胡同，而偏離了學術研究意在推進學術事業健康發展的軌道和法度。所以說，這個實，就是指選題要實事求是，合於現實生活，滿足社會的真實需要。離開生活實踐的所謂“新”和“奇”，也許可能火上一把，時髦一回，但經不起歷史的檢驗，終究是沒有生命力的。

（二）資料的搜集和運用

學術論文的寫作，離不開相關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取捨。一個論點的提出，沒有以資料為根據的論據的支撐，怎麼能立得住腳呢？有一類文章，論點擺了一大堆，就是沒有以充足的資料為基礎的論據做支撐，當然更缺乏充分的論證，結果是論點一條接一條，排骨一樣乾巴巴地擺在那裡，沒有血肉，一點也不豐滿，像是靠“饑餓療法”打造出來的苗條女子，難免弱不禁風。

資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項艱苦細緻的工作。不同學科，資料的搜集方式也不一樣。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對資料的搜集，主要靠對歷史文獻與經典的梳理來完成。像季羨林先生寫作《糖史》，對有關“糖”的資料的搜集，就靠對歷史文獻的手工查找，沒有計算機網絡可資利用。應用學科有所不同，除了從已有文獻中搜集資料，更重要的，是對來自社會生活實踐的第一手資料的搜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工作，很多時候要通過實地考察走訪、田野調查、抽樣調查等方式，獲得第一手資料。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寫作過程，就是一個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搜集材料的典型例子。為了澄清中共黨內對農民運動的偏見，1927年1至2月間，毛澤東在參加湖南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之後，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湖南湘潭、衡山、長沙等幾個縣進行了實地考察。在考察過程中，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在隨後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批評了指責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過火”、“過左”的各種右傾觀點，明確地指出：解決農民問題，就要解決土地問題，這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寫作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在《戰士》週報上公開發表。這個報告，不是靠引證書本和文件，而是通過調查研究，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據以制定黨領導農民運動的路線和策略，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運動的光輝文獻。

不論通過何種方式進行資料的搜集，最初掌握的資料都是雜亂無章、沒有頭緒的。因此，還需要對資料進行細緻的梳理工作。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進而找出規律性的東西，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材料。選題再好，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料作支撐，最好的辦法就是忍痛放棄。因為這種文章是難以最終完成的。只有鋼筋，沒有足夠的水泥，房子是無論如何也蓋不起來的。

有人可能會說，現在寫文章不同以往，有了網絡這一現代化的信息工具，對資料的搜集就不必再像過去那樣費心、費時、費力了，輸入關鍵詞，輕點鼠標，資料應有盡有。不可否認，網絡確實給我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寫作效率，因為它大大地壓縮了我們用於資料搜集的時間。但有些資料搜集方式，網絡是無法取代的，尤其是第一手資料的採集。實地走訪，田野考察，網絡手段無法取代；再者，網絡信息缺少權威性，而且更新太快，所以，對網絡

材料的引用，還是要慎重。

（三）寫作規範和方法

1. 規範

做人要有規範，作文也離不開規範。但這些年來，我們的學術研究，缺少對於規範的關注，認為這是個可有可無的東西。實則不然。學界出現的好多問題，一部分源於考評制度的逼迫，一部分則源於業者對學術規範的漠視。學術規範從研究層面看，有兩重含義：一是指寫作規範；一是指寫作道德。

先說寫作規範。基本的寫作規範或者程式應當是，從選題的確定（應反復徵求意見），到寫作大綱的組合（包括通過資料文獻的不斷掌握，以及廣泛地徵求意見，對寫作大綱的反復調整的過程），再到正文的寫作，以及得出結論的過程。

選題一旦確定，就進入圍繞選題列出大綱的過程。大綱是文章的骨架，支撐起文章的軀體，因此，這是非常重要的環。有的人寫論文喜歡率性而為，不列大綱，信馬由韁，寫到哪兒算哪兒。這也算是一種寫法，但很容易跑題；也有這種可能，寫到中間，無以為繼，斷片兒了。對於寫作經驗並不豐富的寫作者來說，還是應當老老實實地列出綱目，而且最好是層級綱目。綱目之間既要有很強的層次性，又要有內在的邏輯關係。最要緊的是緊扣題旨，不能游離於選題之外。

進入論文的寫作過程，一個需要遵守的極其重要的規範，是在引論部分，扼要綜述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包括學術派別及其代表性觀點，研究進展與不足，進而提出自己力圖有所推進或創新的問題或假設。這樣就讓讀者在作者的引導下，很容易地把握了這一領域的動態，並瞭解作者所做工作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很多人往往無視這一規範，開篇就迫不及待地自說自話，大談該選題及其觀點的創新與價值，而對這種創新的由來和根據卻避而不談，既不顧及前人的貢獻，也無視同行的所得，就好像他的所謂“新觀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讓人不知所云；正是由於缺乏對前人或同行相關研究進展的必要評述，使得對於所研究之“問題”的提出，有些無厘頭；是否有研究的必要，更是讓人如墜雲裡霧裡。

在文章主體部分的寫作中，所遵守的寫作規範，是對所提出的主要觀點、假設或問題，進行充分的說理和論證。具體說，就是對已經取得的文獻資料、調查材料和各種論據進行分析、歸類，分別充實到各章節中，再進行解釋、論證。各種材料和論據，不是天生就可以證明論點或說明具體問題的，需要通過作者細緻的梳理、組織和論證，才能使其變得富有生命力，從而極其自然地為自己的觀點服務。沒有論證過程，只有論點的堆積，是學術文章之大忌。作者提出一個觀點，可能很新鮮。比如說，“和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個觀點確實不同以往。但如果你不能通過嚴密的論證過程來說明、揭示它，這個觀點就只是個口號。如果只是“口號”的堆砌，這樣的文章當然就沒有學術價值，更沒有生命力了。

再說寫作道德。作文先做人。寫作道德是個關於如何做人的大問題。文章寫得好壞，是一個人的技能層面的問題，不關涉一個人的品性；寫作道德如何，則涉及一個人的人格問題，就更要嚴肅對待了。這些年，在社會環境和學術制度環境的影響和逼迫下，出現了無以計數的學術舞弊事件。這些事件的出現，不排除客觀環境的影響，但根本的因素還是在舞弊者自身，是舞弊者的寫作道德或是心態出了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既要治標，健全學術懲處機制，加大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懲處力度；又要治本，改革和完善學術評價體制，“以學術代表作作為職稱評定的基本依據，以學位論文作為授予學位的基本依據，取消以刊物級別、篇幅大小等為依據的量化標準”，緩解

所施與從業者的心理壓力。^④

2. 方法

一般而言，學術文章的寫作，“需要邏輯學或社會調查統計的知識，用正確的邏輯思維和嚴謹的數據組織方式，緊緊圍繞已經確定的理論假設或具體問題，調動自己所學各種知識，通過正論（這是主要的）、反論、設論、駁論、喻論等等手法，論證觀點或問題，得出結論，完成論文”。^⑤這是最基本的方法。進一步說，研究方法又區分為思辨性研究和實證性研究兩大類別。思辨性研究以先驗知識為前提，通過邏輯推理進行分析、歸納。實證性研究方法就是採用類似自然科學的研究範式，強調以經驗證據為理論的唯一檢驗尺度的研究方法。它又細化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兩種方法。思辨與實證兩種研究方法，不存在優劣之別，高下之分，究竟採用哪種方法，決定於論文選題的性質和特徵，以及寫作者的自身喜好和能力。文學研究中的文藝理論，史學研究中的史學理論，哲學學科以及與之相關的學科與分支學科，如美學、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法哲學等領域的問題，當然適合於思辨性研究；一些應用性強的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管理學等等，更適合於實證性研究。所以，一篇論文，單從標題上看，我們就能輕易地分辨出作者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像《論公民與公民意識》，一般會採用思辨性研究方法；《中國可持續發展試驗區研究》，採用的多半是實證性研究方法。

思辨性研究，要求寫作者具備較高的理論素養和抽象思維能力。但由於它以寫作者的先驗知識為前提，面對同一論題，每個人的認識和理解，因其知識背景和視角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不首先對選題所涉相關概念，基於學術積累和共識，進行明確的界定，往往會出現自說自話的現象，而這也正是思辨性研究最易出現的弊端。所以，思辨性研究，一定要交代清楚相關的概念、範疇，這是展開研究的前提。而實證性研究，由於其論據來源於經驗事實，帶有經驗性知識的特徵，這樣就有了一個共同的客觀標準，有利於問題的探討。

寫學術文章，從選題，到觀點，到角度，當然是不斷出新、出奇最好，“語不驚人死不休”，不新，不奇，靠什麼驚人？但有那麼多的人在吃學術這碗飯，某一個問題，大家都在反復研究，再求出新，真是難於上青天了。比如關於魯迅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其中關於魯迅死因的研究成果，達到驚人的1,244項。真可以說是掘地三尺了。即使是這樣，關於魯迅的研究也遠未到黔驢技窮的地步。原因在於，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細化，不斷有新的材料被披露，被發現；隨著科研手段的進步，不斷有新的研究方法被採用。這就是說，不僅是新的材料中暗含著新的觀點，新的方法中也有蘊含著新觀點的可能。當我們不能在現有材料中發掘新的觀點的時候，我們不妨從方法論的角度打開缺口，尋求突破。

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趨向，是學科細分與學科融合並存。一方面，學科分化更加專業和細密；另一方面，跨學科性質的學術融合正方興未艾。比如，一方面，美學被細分為“文藝美學”、“政治美學”、“企業美學”，政治學被細分為語言政治學、行為政治學等等；另一方面，又出現了“生態美學”、政治生態學這樣的跨越文理兩科的學科大融合。這種細分尤其是融合，一個明顯的意圖，就是試圖尋求方法論上的突破。此外，像“生態經濟學”、“生態政治學”等等交叉學科，也是力圖透過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視角和方法，尋求人類社會生態困局的解決之道。方法上的互借和創新，無疑帶動了學術觀點的創新，一些新的概念範疇也因此應運而生。所以，學術論文的寫作，需要有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勇於探索與創新的精神，大膽借鑒和試驗新方法，這是寫出好文章的當然前提。

（四）附屬性文字的寫作

所謂附屬性文字，是指摘要、關鍵詞、說明性注釋、參考文獻等項內容。它們雖然不是文章的主體部分，卻是學術文章的有機組成部分，表現著文章的學術成色和豐滿度，強化著文章的創新程度，同樣應予認真對待。筆者在日常審稿過程中所接觸的一些學術文章，附屬性文字經常佔據相當大的篇幅，有的文章，僅是說明性注釋文字，甚至佔到了文章篇幅的三分之一，可見這些文字在作者心目及其文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 摘要

摘要，是客觀地反映論文主要內容和觀點的、高度凝練的文字信息。由此可見，摘要文字的特點，是單刀直入，用最為簡潔幹練的語言，邏輯地抽象和概述文章的主要內容和觀點。因此，字數不宜過長，二三百字為宜。

摘要到底有多重要？打個比方，如果說，標題是文章的“眼”，從這裡能夠洞徹文章的“內心”，那麼，摘要就是文章的“臉面”，由之可以大致窺知文章的美醜。所以，讀“摘要”，往往是學術期刊編輯判斷一篇文章是否值得通讀的一種“偷懶”的辦法。

寫作摘要，最為常見的問題，一是文字冗長、散漫；一是把摘要寫成了關於論文的主觀評述性文字。文字太長，難免有所枝蔓，反而淹沒了文章的主旨，淡化了文章的主要觀點。而把摘要寫成評述性文字，對文章進行自我評價和定性，難免有自賣自誇之嫌，容易失去客觀性。常見的是，“本文認為如何如何……在該領域實現了何種突破……填補了該領域的哪些空白……如此等等”，都屬於對摘要的誤寫。其實，作為學術文章的寫作者，當一篇文章形成正式文本的時候，你的任務就算完成了。至於文章的評價，那是別人的事情。作者只是“運動員”，所以就不要越俎代庖，去行使“裁判員”的評判職責了。因此，在給自己的文章寫摘要，應當堅持一個七句話的寫作原則：內容完整，重點突出，語言精當，立場客觀，表述規範，獨立成篇，篇幅適當。

2. 關鍵詞

關鍵詞是反映論文主題和主旨的概念性的詞或詞組。其選取標準是反映主題，專業特點，公知公用，名詞性詞語。關鍵詞不是對論文題目的簡單分拆，這種情況我們在翻閱學術期刊時會經常見到，而是通過詞或詞組對文章主旨的一種反映形式。比如說，一篇標題為《關於公民權利研究的思考》的文章，其關鍵詞不是“公民權利”、“研究”、“思考”的簡單組合。這其中，只有“公民權利”或者是“公民”、“權利”屬於關鍵詞，因為它們反映著文章的主旨，並且符合其他各項選取標準；“研究”、“思考”等詞語，既不反映這篇文章的主旨，也無專業特點，故而不能作為該篇文章的關鍵詞。從文章標題看，這篇文章既然以公民權利為研究對象，就不能不涉及與之相對應的公民義務，就不能不涉及對公民權利和公民義務予以制度界定的憲法與法律。所以，這篇文章的關鍵詞，應當由“公民”、“公民權利”、“公民義務”、“憲法”、“法律”等詞語和詞組組成。

3. 說明性注釋

說明性注釋，是標注於頁下的、用以對某一概念、觀點或現象進行進一步說明的注釋性文字。當然，有時也用來說明某項研究的進展情況。由於這些文字一般比較瑣細，放在正文中，會影響到文氣的流暢性，所以一般會作為解釋性文字置於文下。說明性注釋雖然是學術論文的補充性文字，但它並非可有可無。從中往往可以透視出作者的研究旨趣，學術視野，研究思路，以及學界的研究動向、研究進展等學術信息，不可輕視。甚至可以說，這些文字是學術文章不可或缺的構

成要件。沒有說明性注釋的學術文章，其學術性可能會大打折扣。正因如此，一些質量上乘的學術文章，往往少不了說明性注釋文字，有時甚至相當大的篇幅。發表於《國際社會科學雜誌》的《發展話語中第三世界婦女知識的構建》一文，共計 10 頁，說明性注釋文字的字號儘管比正文小一號，但仍然佔了近一頁半的篇幅。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我們平時閱讀學術文章，也不應忽略對說明性注釋的閱讀，其中經常會有一些富有情趣的思想內容，更具可讀性。

4.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一般列於文後。參考文獻有兩種類別。一種是引文性參考文獻，它是對文章中具體引文出處的信息標示。一種是非引文性參考文獻，一般單獨著錄於引文性參考文獻之後。有這樣一些參考文獻，雖然未被論文作者所直接引用，但它們對作者的寫作構思有所啟發，對作者觀點的形成有間接的幫助，都可以被列為非引文性參考文獻。這也體現著論文作者對他人著作權的尊重。限於篇幅，一般的學術文章，只列出引文性參考文獻。如果說，非引文性參考文獻可以被忽略的話，那麼，引文性參考文獻，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被省略的附屬性文字。

談到引文性參考文獻，就不能不提到引文問題。引文一般有三種性質或類別。一種引文，是作為論證材料，幫助作者立論的引用文字；一種是作為與作者所持觀點相異或相對的觀點予以引用的文字，一般見於爭鳴性文章之中，意在通過對他人成果的引用，形成爭鳴和對話；還有一種，是學術動態性引用文字，引用他人成果，是為了說明該選題的研究現狀與進展，以及存在的問題，然後，以此為基礎，展開自己的研究。以上三種引文的出處，都應在參考文獻中標注清楚，這既表明作者對他人成果的尊重，也表明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時也便於讀者查閱相關信息。

有些寫作者，寫論文很少著錄參考文獻，甚至根本就不著錄參考文獻。這樣的文章，十有八九不會是像樣的學術文章。不著錄參考文獻，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作者不懂學術文章的寫作規範，憑一時的靈感，偶然有一個感想，一種觸動，就動手寫作，全然不顧這種來自一時靈感的所謂新鮮觀點，在他人那裡早已成為舊識。因為他不懂得文獻檢索，不去參考別人的成果，在他的文章中，當然就沒有“參考文獻”一說了。另一種情況，涉及學術不端。明明引用了他人的成果，既不用引號標注，更不著錄參考文獻。這就另當別論了。

有關摘要、關鍵詞、參考文獻等等附屬性文字的寫作要求的這些說明，意在提醒論文作者，一定要重視這些文字的寫作和標注。功利一點兒說，重視附屬性文字的寫作或標注，甚至有可能會增加文章被刊用的可能性。學術期刊的編輯，是很重視學術規範的。他拿到一篇文章，並不一定直接就進入到對文章正文的閱讀狀態，而是往往先看你的選題的新穎程度，摘要的學術含量，參考文獻的豐富程度。僅是這些內容，就能夠在相當程度上透露出這篇文章的學術含量，為編輯提供一定的取舍參考，決定著他是否有進一步的興趣，去閱讀正文。

三、關於文風

文風，拋開其他，單從技術性層面上說，就是行文的風格。文如其人，人的品性不同，寫作風格也不相同。有人會說，文如其人，那是就散文、雜文等文學性文字而言的，學術性文章的寫作，無論是選題立意，搜集資料，檢索文獻，還是整理提綱，正文寫作，都是很枯燥的事情，而且又有那麼些寫作規範的制約，哪裡還談得上寫作風格？其實不然，學術文章照樣能寫出風格，寫出個性，形成獨特的文風。

記得在 1990 年代初，筆者曾就學術文章的寫作請教過一位歷史學家——山東大學歷史系的

田昌五先生。田先生是性情中人，性格豪放，為人率直。他很爽快地給我講起文風問題，說到激動處，甚至從座位上忽地站立起來，不停地揮動著手臂。可惜，由於時間太久，有些內容我已經忘記了。但是有一句話，我卻印象深刻，這句話雖然只有寥寥幾個字，但它卻連同田先生講這句話時極其投入的、有力地揮舞著手臂的形象，一同刻印於我的腦海。田先生的話是這樣說的：“怎樣才能寫出好文章？就三個字：情，理，勢也！”雖然是寥寥三個字，但卻包含著足令學林中人十年參悟不透、三生受用不盡的豐富內涵。以下是筆者的一點感悟。

一曰“情”。知識分子是什麼？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責任和道義的擔當者。這樣一種社會身份定位，就使得我們在從事學術研究事業時，在選擇研究方向時，必須把自己的所學，或直接或間接地與圍牆外的社會生活結合起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擔負起我們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所以，這個“情”字，小裡說，是對研究選題要抱有濃厚的興趣，要有情感的投入，要有探尋的欲望；大裡說，是要對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抱有深摯的情懷，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去從事我們的學術研究，就會有一個大寫的“情”字，鼓舞著我們，牽動著我們，鞭策著我們。通俗地說，當我們以極大的熱情關注社會生活實踐，由此發現社會問題，並帶著問題去研究、去寫作，而不是很私人地為學位、為個人前途而研究和寫作的時候，肯定會產生出更加猛烈的寫作激情和創作衝動，這種激情和衝動，既來源於這個大寫的“情”字，又是這個大寫的“情”字的表現方式。帶著這個“情”字去寫作，就會活化我們筆下的文字，帶給讀者以超越工具理性的、更富感染力的閱讀體驗。

二曰“理”。說到底，學術文章的根本，還是在於一個“理”字。理，就是道理，理據，論據。理與情的關係，應當是理在情先。理是基礎，情由理生。脫離開理據基礎的情感抒發，有無病呻吟之嫌，為學術文章之大忌。寫學術文章，確定選題只不過是為文章的寫作，劃定了一個大體的方向和範圍。更為重要的，是具體觀點的提出，以及觀點之成立與否的論證。“我的具體觀點是什麼？你可以設想出一個或幾個觀點，但它們僅僅是一種假設，通過許多證據、材料，通過嚴密的論證和適當的論證框架結構，證明你的假設是成立的，這才能形成論文的主體。”^⑥這個運用充分的材料，用思辨或實證的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就是擺事實講道理的過程，以理服人的過程。學術文章，觀點的提出和假設，要大膽，沒有膽略，難以產生不同凡響的觀點；但論證要格外小心，要戰戰兢兢，要讓事實說話。即使是握有事實，也不能保證你的觀點永遠正確。因為你對事實的瞭解和掌握，畢竟是有限度的；即使是掌握了事實，你的理解也許是片面的——這正是學術研究離不開爭鳴的奧妙之所在。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在文學史領域，胡適先生當年有一個著名論斷：“故事詩在中國起來的很遲，這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見的現象。”在當時尚未發現存在古代故事詩實證材料的背景下，他大膽猜想，可能有兩個原因造成這一現象——也許是中國古代民族的文學根本就沒有長篇的故事詩；也許是古代本有故事詩，因為文字記載的困難，不曾有記錄，故不得流傳於後世。因而胡適先生得出結論：古代的中國民族是一種樸實而不富於想像力的民族。但是，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在湖北、江蘇、浙江等地，陸續發現了幾十部漢民族長篇敘事詩。1999年，民間文藝搜集者又在武當山下的呂家河村搜集記錄了15部長篇敘事詩。這個事實，證明了胡適先生當年提出的那個結論或假設，是證據不足的，應當予以修正。中國文學史因此也應該重寫。^⑦這個例證說明，正是在這種以說理為表現形式的、正論與駁論的不斷交鋒中，學術事業得以向前發展。

三曰“勢”。文章應當有一種雄渾的氣勢，這不僅僅是指政論文章，學術文章同樣少不得這

種氣勢。不論何種性質的文章，如果沒有“力拔山兮”的氣概，就難以駕馭和控制讀者，當然也就不能向讀者灌輸你想表達的觀點和理念，你的文章就成了一堆廢紙。氣勢來源於“情”和“理”，只要觀點及其論證抓住要旨，入情入理，文章自然就會透露出一種攝人心魄、令人無法抗拒的氣勢。真正的好文章，其氣勢是自內而外地自然透射出來的，由於源於情，入乎理，這種氣勢顯得順理成章，渾然天成，絲毫沒有做作的痕跡。細細思之，自內而外地自然透射出來的這股氣勢，其源泉就在於邏輯的力量。不論是定性還是定量研究，無不是通過一環扣一環的理論推演和事實推斷，彰顯出邏輯的內在力量和氣勢。此外，文章的氣勢，還來自於高遠的立意。何謂“勢”？居高臨下謂之“勢”。真正會寫文章的學問家，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有超強的思想駕馭能力，如庖丁解牛，遊刃有餘：宏觀題目能把它寫“小”、寫“實”，大處著眼，小處入手，讀之絲毫不覺空疏——可概之為“宏觀題目微觀化”；微觀題目則能把它寫“大”、寫“遠”，微處著手，意在筆外，讀之玩味良久——可概之為“微觀題目宏觀化”。秘訣恐怕端賴於立意的高遠，賦予文章一種高屋建瓴的氣勢。

常見一類所謂學術文章，乍一看，選題宏大，觀點唬人。但到了體現真本領的論證過程，就現了原形：或缺少實證材料，空洞無物；或東拼西湊，缺乏邏輯性，漏洞百出；或引經據典，一味靠經典理論為自己的觀點壯膽。這是典型的虛張聲勢、虎頭而蛇尾的作為，與扎扎實實的學術文章所自然顯露出的真誠氣勢毫不相干。這類文章，是典型的偽學術文章。

上述三點之外，還有一點心得，那就是“捂”。寫學術文章，類似炒股時做長線的操作方法，寫作完畢，經過精心的打磨以後，不要火急火燎地急著投給心儀的雜誌，而是宜做冷處理，像長線炒股一樣，把寫好的文章捂起來，至少一個月甚至兩三個月以後，再拿出來冷靜地濾一遍，會發現在激情狀態下寫出的東西，有不少當時所不能發現的不足甚至漏洞，需要加以理性處理和彌補。如此，投出的文章被刊用的可能性就會大為增加。當然，如果同時再拿給同行把一下關、掌一下眼，那就再好不過了。

總而言之，學術文章的寫作，沒有一定之規。基本的規範要遵守，但又不能被規範所束縛，喪失掉最應珍視的獨立思考的思想品格，抹煞掉文章的獨特個性。再有，文章是靠筆或者是鍵盤寫出來的，因此，就需要勤思考，多練習。勤思考，做個有心人，持之以恆地把學術心得和研究資料分門別類地記錄下來，需要時手到擒來；多練習，在實戰中發現不足，在實戰中總結經驗。

①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6頁。

②介子平：《“我是編輯我可恥，我為祖國浪費紙！”》，成都：《出版商務週報》，2016年4月30日。

③劉京希：《理論研究要超前——訪高放教授》，濟南：《文史哲》，1988年第3期。

④《關於恪守學術規範的十點倡儀》，北京：《中華讀書報》，2004年10月27日。

⑤⑥陳力丹：《碩士論文寫作的基本步驟和規範》，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2009年11月8日。

⑦劉錫誠：《禮失，求諸於野》，北京：《中華讀書報》，2004年11月3日。

作者簡介：劉京希，山東大學《文史哲》副主編，教授。濟南 250100

[責任編輯 劉澤生]